



陝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第二集)

堯山聖母廟與神社

秦建明 (法)呂敏 編著



中華書局

陝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第 二 集)

堯山聖母廟與神社

秦建明 呂敏(Marianne Bujard) 編著

中 華 書 局

2002 ·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堯山聖母廟與神社/秦建明,(法)呂敏編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3
(陝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ISBN 7-101-03749-6

I. 堯… II. ①秦…②呂… III. ①民俗學—研究—陝西省②寺廟—
研究—陝西省 IV. K892.4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03739 號

堯山聖母廟與神社

秦建明 呂敏(Marianne Bujard)編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7 印張·45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定價:42.00 元

ISBN 7-101-03749-6/K·1578

**ENQUÊTES SUR L'EAU ET LA SOCIÉTÉ LOCALE
DANS LES PROVINCES DU SHAANXI ET DU SHANXI**

VOLUME II

LE CULTE DE LA DAME DU YAOSHAN

PAR

QIN JIANMING & MARIANNE BUJARD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CENTRE DE PÉKIN

2003

本書承法國遠東學院及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資助出版

謹 致 謝 忱

人活的就是個文化

——山西四社五村農民

《山陝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

總 序

法國高等社會學學院 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

北京師範大學 董曉萍

法國遠東學院 呂 敏(Marianne Bujard)

本叢書是中法國際合作項目《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的初期成果^①。項目的主持單位為法方的法國遠東學院和中方的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項目組成員共 15 人,包括中法雙方的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地理學、考古學、水利學和金石文字等多學科的專家學者。自 1998 年至 2002 年,經過全體學者的努力,現已完成了項目中的田野調查部分,搜集了相對豐富的資料。

我們的調查範圍,是位於黃河以北的陝西關中東部和山西西南部的灌溉農業區和旱作農業區,調查的目標,是由縣以下的鄉村水資源利用活動切入,並將之放在一定的歷史、地理和社會環境中考察,瞭解廣大村民的用水觀念、分配和共用水資源的群體行為、村社水利組織和民間公益事業等,在此基礎上,研究華北基層社會史。本叢書所介紹的資料,都較為具體地描述了這方面的內容。

我們的調查選點標準如下:

(一)有相對豐富的、能被搜集到的,基本上屬於未發表的地方資料,如民間水利碑冊等;借助這些資料,瞭解基層村社管理水資源的穩定傳承和社會變遷的狀況。

(二)有被地方史料所記載的、或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水利糾紛事件,通過這些事件,尋找調查的入口,以進一步開展對村社用水關係、管理制度和合理利益觀念的調查。

(三)有歷史上形成的村社組織,能有效地控制當地的水資源,既相對獨立,又部分地與

^① 本項目得到臺灣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及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的熱心支持。

基層政府合作,保證村民用水。

(四)有地方合作者,熟悉和重視本地的歷史,可以帶領我們下去調查,能與村民一起解釋所搜集到的資料,也願意把本地資料放到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去做比較研究。

據此,我們選定了四個調查點,即陝西省的涇陽縣點和蒲城縣點、山西省的洪洞縣點和四社五村點。所涉及縣共六個,包括陝西省涇陽縣、三原縣和蒲城縣、山西省洪洞縣、介休縣和霍縣^①。其中,陝西省的涇陽縣、三原縣和山西省的洪洞縣與介休縣,都有古代水利灌溉工程,一些農田水渠沿用至今,屬灌溉農業區;陝西省的蒲城縣和山西洪洞、霍縣交界的四社五村,都沒有水利灌溉系統,屬旱作農業區;兩者的反差很大。然而,兩者無論水量多寡,却都存在着現實的或象徵性的水資源管理兩種形式,這是一個共同點。如在陝西省的涇陽縣和三原縣,擁有舉世聞名的古渠涇惠渠,農田水利灌溉系統一直十分發達,但民間依然流傳着象徵性的用水習俗。距之百里開外的蒲城縣,為乾旱原區,每年都要舉行向堯山女神祈雨的象徵性用水儀式,但村民也有窖藏雨水的現實對策。山西四社五村是一個嚴重缺水山區的村社組織,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村民長期遵守着公有共享的原則,同飲一條山泉渠水,對有限水源施行嚴格的現實與象徵性雙重水管理,創造了近萬農民與乾旱共處的奇迹。這些村社水利活動資料,各具地方意識,又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研究資料系統。

我們的工作內容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開展聯合田野調查,搜集調查點的歷史文獻和口頭資料,同時瞭解這些資料的民間解釋和社會功能。

二是共同使用所搜集到的資料,並參考其它相關資料,從多學科的角度,對資料進行描述、分析和綜合研究。

本叢書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形成的。各調查點的資料編為一集,共四集。以下重點說明這些資料集的學術價值、選擇原則、研究方法和體例內容。

一、村社碑刻和手寫本的學術價值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已開始大規模地搜集、編纂和出版新編地方志的工作,包括編撰縣水利志著作,這為本項目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在我們抵達調查點後

^① 山西省介休縣和霍縣現為縣級市,在本叢書中,因所搜集的碑刻水冊資料、地方志和田野訪談資料等大多使用原縣名,本叢書的性質也主要是描述研究資料,根據資料出處的情況,同時為了讀者查閱方便,故在此仍暫沿用“介休縣”和“霍縣”的原名。

發現，縣水利志的編撰人員不僅曾親自下鄉搜集資料，而且瞭解它們的價值，因此能夠理解我們的工作，樂於向我們提供資料的綫索^①，其中有些資料與我們在此介紹的資料是相似的。這些資料大都是從縣以下的村莊中挖掘出來的，含水利碑刻、水冊水規、官方或私人的手抄本（如報告、技術設計規劃和對水利糾紛的描述）等多種形式，藏量豐富。

這些從山陝基層社會搜集到的大量水利資料，可以打破從前認為華北地區缺乏水利資料的偏見，證明華北民間保存水利資料的實際情況，並展示了這類資料的多樣性。然而，到目前為止，它們還是被忽視的，許多水利碑刻和工程技術抄本無人問津，更不要說給予研究。其原因大概與以往學術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觀念有關。

在史學和金石文字學領域，碑銘學研究碑刻，早已取得公認的地位。碑銘學所討論的碑刻的性質，也多有定論，即要對上層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地點具有某種重要的紀念性，碑刻才有價值。如此說來，基層社會的民間碑刻就不在此列了。還有，那些村社水冊、水會章程和水利工程報告等，為民間人士所私藏，歷來方志不收，抑或非歷史名人、或近、現代知名工程技術人員所撰寫，也不能成為歷來學界所青睞的史料。

從調查看，這些資料是有其獨特價值的。其中，民間碑刻大都敘述了鄉村社會的內部矛盾、規章制度和祭祀儀式，記錄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群體事件，像縣衙判決水資源歸屬的公文、興建村落公共水利設施的公議章程、修廟緣起和村民捐資人的名單，地方朝聖的里社和禮儀規矩等。它們在地方社會世代流傳，使一些鮮為人知的地名為後人所記憶，也使許多普通老百姓因此而揚名。也有少數碑刻，因附會了歷史名人或地方風物，偶爾被官修方志收入，進入了官方文獻系統；但大多數碑刻都掌握在村民手中，發揮了應有的民俗作用，它們都豐富了地方文化遺產。

至於村社水冊、水利會章和水利技術報告等手寫本，因產生背景不同，也經歷了不同的命運。一些文稿的寫作目的，是為了給村人或家族小群體留下回憶，並沒有引起官修方志的注意，未被納入書面文獻系統予以保存，在民間的傳播面也很窄，因而消亡率較高，迄今所見者，多為零冊散篇而已，其影響力也遠不如碑刻。它們非出自古代文人學士之手，也非近、現代技術工程師所寫，往往是一面之詞，所記載事件也大多是主觀的、出於一己之利的、非連續性的行為，與官修方志和村社碑刻都不一樣，因而很難融入地方文化遺產之中。

^① 參見《涇惠渠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王智民主編《歷代引涇碑文集》，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1992。鄭東風主編《洪洞縣水利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清）孫煥倫《洪洞縣水利志補》，鄭東風、張青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涇陽縣水利志編寫組編《涇陽縣水利志》（送審稿），涇陽：1989。白爾恒提供《渭南地區水利碑碣集注》，內部資料，涇陽：1988。續忠元撰稿、王融亮修訂《介休縣水利志》，介休縣水利水保局，介休：1986。

但是,如果站在手寫本撰主的立場,從他們所着眼的短時行為上考察,却會發現,這類手寫本的用途是為瞭解決具體問題的,裏面有小群體恪守的水規制度,還有將之聚合一處的原則,或使之對立的緊張氣氛。這種資料表現了當時人的情緒和爭執,我們也應將其置於一個特定的背景中去理解。從這點出發,還能發現,村社的水冊會章等有了新的意義,它們不僅是分配和使用水資源的規章制度,也有減少和避免用水者之間對抗的意圖。而這類信息正是基層社會運行機制的具體組成部分,能讓今人看到當時社會的衝突狀況和人們的日常選擇,這本身就是一段活生生的歷史。

總之,在基層社會中,村社碑刻和手寫本等資料,無論具有紀念意義與否,都是一種複雜的社會行為的產物,這正是它們的學術價值所在。

二、選擇資料的原則

應該說,我們所收集的資料,都不是為寫歷史而寫的。它們是非官方的地方檔案。它們并非刻意地將歷史上發生過的民衆行為記錄下來,又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流存至今。我們只能在這類材料中做選擇,看看它們究竟反映了什麼?能讓我們做怎樣的研究工作?

我們在選擇資料中,有一個基本的考慮。我們的調查主題,是基層社會的水資源管理,為了能充分展示村民的觀念和活動,我們所選擇的調查點都有較長的歷史,各調查點的資料也都與地方群體用水行為有關,它們由村社組織負責,實行社首自治管理、或聯村社區管理,監督和控制用水人口的團結與對立行為,達到合理用水的目的。各類碑刻、水冊或技術報告手寫本等資料,都反映出一種群體意願:解決那些顯然存在又難以協調的分歧,或儘量控制那些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等等。它們正是由於具有這種地方集體性的價值和作用,才能成為研究基層社會史的準確材料。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資料所揭示的地方社會史是有特殊性的。它們并不反映功能學派所強調的社會運行的基本要素,如人口的增減、土地所有制和資產結構的變遷等。它們所反映的是村落、家族或個體成員之間在管理水資源上遇到的具體問題,如強調水源地的地點和水源分類、水渠的確切位置、維修渠道的技術手段,管理渠水系統的授權、控制、調動和分配水資源的村社組織及其規章制度,還有水的概念、對用水行為的理解、象徵性用水的內涵及與之相關的用水習俗等。總的說,它們從自然地理、技術事實、水利制度和民間管理組織諸方面,介紹了豐富的地方知識,讓我們能夠從中分析基層社會的組織形式和組織能力,民間組織與縣級官方政府的關係,和由自下而上的角度所折射的當時社會和國家的形象,我們由此得到了一把分析基層社會的鑰匙,這正是我們的研究目標所在。

如何在實際工作中切近這一研究目標呢？首先，我們感到，各個調查點的資料，能讓我們接觸到地方村落、家族與個人的不同利益。從不同利益的矛盾衝突入手，我們發現，一些個人或群體中的部分成員是維護局部利益的，也正是在維護局部利益中，那些複雜的、長期存在的民間組織才得以存活和發展，他們在各自的管水歷史中，創造了自己的行為邏輯和概念，對促進地方社會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我們的工作，是力求把握民衆自己的行為邏輯和概念，從中分析地方社會的內部組織結構及民間組織與縣級基層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其次，歸納這些資料，看到基層社會史與官修方志的區別。官修方志是按照國家行政職能的管轄範圍來確定地方志的編寫體例的，分行政區劃、建制沿革、衙署機構、集市賦稅、名勝古迹、文苑雜纂等，顯而易見，這種正史與基層社會史是迥然有別的。

最後，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項目名稱為“華北水資源與社會組織”，但這並不等於說，通過華北水利和水利管理的部分調查研究，能夠瞭解整個華北社會的歷史趨勢。我們的學術目標，是要通過華北民衆有能力管理像水這樣重要的物質資源的視角，觀察其民間組織的活動形態，分析華北基層社會群體怎樣被迫做出生存選擇，怎樣去維護自身利益，建立社會等級，傳承思想信仰和行為的準則，並在這一層次上，建立他們的特殊的社會結構。正是這些資料，為我們再現和描寫了華北社會整體和主流歷史中的部分情況。

三、綜合研究方法

我們所使用的村社碑刻和手寫本，是在官方體制之外產生的基層社會史資料，從各調查點的情況看，它們的內涵，存在於傳承和保存它們的村社群體中，見於它們被使用的社會功能中，對它們的解釋，無一不涉及到整個地方社會文化系統，因而，要進行深入探究，就必須採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

在解釋基層社會史料上，歷史學者的探索，需要依靠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把個人變成學術活動的工具，放到地方社會的網絡之內進行工作。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解釋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們看到，我們的注意力應該向哪裏靠近？應該在哪些問題上聚焦？而在實地調查的過程中，歷史學者所感興趣的“變遷”問題也呈現出來了，主要表現在個人和村莊推選水利代言人的條件方面，在有效地控制水資源和分配制度方面，以及在村社組織適應時代變化進行自我運作方面，然後歷史學者可以給出比較切實的詮釋。人類學和民俗學者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認為，水資源管理不屬於他們的研究範疇。水資源管理的資料，屬國有資源和國家歷史的範疇。後來通過田野考察證明，在基層鄉村社會，村社組織的作用，一般都大於國家行政管理的作用。民間還利用某些官方規則和其它事件，發展了許多適

合村社自治的集體管理和分配形式,如山西四社五村的輪流用水制度、陝西蒲城十一社輪流祭祀堯山女神的制度等。這種民俗慣行,正是人類學和民俗學非常重視的研究範疇。更重要的是,人類學、民俗學和歷史學者能够在通常被稱為“民俗”的文化層面上,攜手共同研究,而此時人類學和民俗學者的一項工作,就是跟歷史學者一起去發現民間文獻,在我們所研究的霍縣,這種管理文化早在公元 12 世紀的碑刻中已被記錄。

所有資料——不論是民間的、還是涉及官方的——都應該被理解為各種勢力彼此互動的結果,其互動關係是在村社組織管理水資源的具體方式、傳承歷史授權與獲取現實權力的實際過程中,以及公眾價值體系對這種權力的表述之間進行的。這樣一來,我們便有可能把基層社會史料放到“活”的文化中去觀察。這些資料又是通過地方代言人的口碑進入地方文化系統的,所以我們在編輯這些資料時,還要把地方社會的書面文獻和田野口頭訪談資料放在一起,共同構成資料集。我們認為,也只有把這兩類資料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對基層社會史的完整理解。

我們的做法也許會讓讀者吃驚。因為,人們已經習慣於清楚地區分上層書面文化與下層民間文化,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文人傳統,而對後者的認識,往往通過它的物質文化部分——民俗學家所收集的服裝、飾品、工具以及各種日常器物,或是通過一些文化活動——也由民俗學家輯錄和闡釋的故事傳說、歌謠戲劇等來獲得的。然而,這種涇渭分明的分類,只反映了我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種想象。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它還曾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其實質是憑藉書面文化的功能,證明上層文化的永久性,把地方社會的不同信仰活動綜合為一種普遍性的價值觀。中國封建社會早就利用這種普遍的價值觀來統一多樣性的地方文化和民俗學家所發現的民俗文化了。本項目的目標,就是要打破這種文字與口頭資料的壁壘,使精緻古老的中國文字與家常便飯的口頭民俗成為同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們主張把基層社會文化視為一個整體,其中有享有盛譽的文人書面文化,也有從民俗文化中產生的社會價值觀和群體規範,它們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呈現為一個總體架構。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的觀點。

我們在研究各調查點的碑刻和手寫本時發現,它們所用的表達方式是古老的,但抄寫的時間頗近,這一線索證明,許多古碑水冊可能還“活”着,它們的生命力可能是綿長的。但只看文本,它們錯訛多舛、頭緒紛亂,使用價值不大,而從民俗的角度看,還有待於民間解釋作證實。通過田野調查發現,正是在這種文本裏埋藏着“生機”。古碑水冊的所有權,歸民間村社組織,它們是民間的村落自治統治的象徵。誰擁有古碑水冊,誰就治理一方社會。在當地掌權人手裏,古碑水冊還代表着水權,每年都要祭祀一次,確認一次水權的歸屬。從社會功能上說,不是文字文獻,因而它們的文字錯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文本,穩定地方社會的

用水秩序。

我們也應該從這種角度考察陝西蒲城縣的堯山廟碑群。如上所述,不能把村社碑刻只看作是一般的歷史紀念物,而且也應看作村莊和個人歸屬該聖地的具體表現。當地的民間組織世代代斯守着這些廟碑,年復一年地做社供奉,是為了獲得一種權利,以得到堯山聖母的恩惠和庇護。在廟碑上,還鐫刻了大量捐資者的名單,對此以往碑銘學的出版物是忽略的,我們認為,它們也值得研究,它們將人名和捐資相聯繫,捐資又和權利相聯繫,這正說明神靈與村民之間的神聖關係,堯山廟祈雨儀式的整個社會意義也就出現在這裏。

我們在對山西洪、霍交界的四社五村調查中發現,每個村莊,不論大小,都視水冊為一種道德法規。村民確認這種法規,等於確認共同用水的社會契約,其中包括借水不還的習慣法等(即在有取水權的村莊內,缺水村向有水村借水,事後不還,被認為是合理的)。當地人遵守各種水規祖制,證明大家是屬於同一個用水社區的,而每一村社對這個社區的生存和發展,都負有責任和權利。四社五村的社首集團核心“老大”、“老二”和“老三”村,近年已陸續打井,有的已改用井水,不再使用山泉渠水,但還在為四社五村的山泉水渠投資捐工,參與工程維修,恪守水規舊約。對他們來講,這是唯一的方式,能保證他們在社區集體中的位置,維持他們以往的水權。

通過考察,我們還發現了基層社會對水利糾紛的處理辦法、不同村社組織之間的網絡聯繫,以及這些民間組織與國家機器的關係,能夠理解許多民間規約的產生、保存和使用的實際過程。更重要的是,使用這類資料,可以發現不同地方社會的個別歷史的統一性,可以描述個別的社會體系,也能研究地方社會的統一性,找到其大同小異的管理模式。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現象是,這類資料說明,這種統一性的由來,不一定是國家行為或官方政府行政干預的結果,它往往體現了地方代言人(如地方知識分子、渠長斗長、社首和村民中能言好鬥的強人等)的歷史作用。由他們出面說話,能協調、綜合和統一官方管理條例與本地傳統水規,使水資源管理制度能在千差萬別的村社環境中得以施行。在我們所調查的陝西涇陽縣個案點,據涇惠渠的前身——秦鄭國渠時代遺留下來的水規,用水村應按水程交納水糧。在後世社會中,這條水規還在清峪河和冶峪河一帶的小範圍農田灌溉系統內使用。然而,該灌溉系統內的用水,只有在水量充足的季節才是公平的,一旦發生旱情,水資源緊缺,就會出現不公平用水的藉口。從當地資料看,清峪河下游村的水利代言人正是從反面來利用古代水規的。他們把它從維護普遍利益的制度,變成維護局部利益的制度。具體策略是,提出下游村歷來繳納所有的官方水糧,應控制全部用水權,否認上游用水的權利。通過這一資料,我們可以認識到基層社會的一種歷史事實:下游村基於狹隘的利益,利用歷史水規,製造“合理性”危機,力圖自己把持水權,壓制上游村用水,結果反而引起上游村違規用水。我們在收集資料

中,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這種行為,瞭解到基層社會水管理變遷的實際過程。

四、本叢書的編輯體例和內容

本叢書共有四冊資料集,每冊都有對各自調查點的地理介紹和對所考察對象的專題描述,在體例上是大體一致的。每冊的內容,既說明調查點的資料特徵,也指出所涉及縣的情況,點面結合,儘量展現研究對象的資料系統和文化生態全貌。

第一冊,陝西涇陽縣和三原縣分冊。介紹從這兩個縣所搜集到的資料。這兩個縣的涇惠渠水利系統十分古老,地位重要。為了展示涇惠渠資料系統的整體形態,本冊也採用了少量涇陽縣和三原縣已發表的資料。涇惠渠的資料能證明大規模水利系統與水利組織的管理情況。本冊還附有少量的富平縣資料,能揭示鄉村小規模民渠的管理方法,如書中提到的冶峪河和清峪河小型水利系統,其中,清峪河橫貫涇陽和三原兩縣邊界,其支流冶峪河獨自流過涇陽縣,我們從中能看到另一種情形:小型的民渠管理明顯地模仿大型水利系統的管理,即清、冶兩渠的管理規章是依賴於涇惠渠的前身——鄭國渠的管理章程的,在具體實施中,則還要依靠上、下游村莊的調解,及涇陽和三原兩縣之間的協調,才能達到管理目標。

第二冊,陝西蒲城縣分冊。該點考察鄉村社區以象徵性水資源管理為主的個案。在此冊中,搜集了古老聖地的資料,包括當地崇拜堯山聖母的儀式和堯山廟石碑群的資料。它們說明,在被女神保護的十一個民間村社之間,有長期的歷史合作關係,調查者同時發現,他們之間的權力競爭十分激烈,目的讓別人知道,他們都有得到女神保護的權利。

第三冊,山西洪洞縣和介休縣分冊。內容包括在洪洞、介休兩地搜集到的水利碑文。洪洞縣廣勝寺的碑文大部分已能看到^①,介休縣源神廟的碑文過去大多未刊布過。就對這些碑文的實地考察看,廣勝寺附近有水泉,歷史上流經洪洞、趙城、霍州三縣^②。在廣勝寺與源神廟的神權控制下,古代曾產生三、七分水制度,為各縣公平提供用水。

第四冊,山西四社五村分冊。介紹霍山脚下十五個缺水村莊共同使用的十八通碑刻和八種水冊。四社五村位於臨汾地區北部,地處原洪洞縣、趙縣與霍縣交界地帶。村社組織的核心集團是按家庭排行組織在一起的五個主社,自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每個主社輪流負責一年的水管理,給十五村提供生活用水。當地主要使用天雨水生存,嚴禁灌溉耕地,只許人畜飲水,以保證基本的生存條件。四社五村人發展了一種不灌溉的旱

① 參見扈石祥《廣勝寺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中收入25通碑文。

② 山西省趙城縣於1954年與洪洞縣合併。

作農業生活，創造了長期在嚴重缺水地區安居的社會格局。

五、致謝

在這套叢書即將出版之際，我們謹向中國民俗學家、中國教育部國家重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鍾敬文教授(已故)、臺灣清華大學王秋桂教授、法國漢學家、法國遠東學院前院長龍巴爾(Denys Lombard)教授(已故)和現院長戴仁(Jean - Pierre Drège)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們先後給予本項目的支援和指導。

參加本項目的 15 位學者在多學科合作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來自以下大學和科研機構，我們也要感謝這些單位的積極支援：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與環境保護與城市規劃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陝西文物技術保護中心

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

法蘭西學院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

在此一併向陝西省和山西省各調查點的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水利技術人員、鄉鎮文化工作者、村民委員會、村社社首和廣大村民表示由衷的感謝！各省、縣主要地方合作者的名單，我們將在各分冊中一一列出和分別致謝。

最後，讓我們向為本叢書的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柴劍虹先生和中華書局其他有關人員致以誠懇的謝意。

Hydraulique et société en Chine du Nord

Christian Lamouroux (EHESS)

Dong Xiaoping (Université Normale de Pékin)

Marianne Bujard (EFEO)

Le programme de recherche "Hydraulique et société en Chine du Nord" vise à étudier plusieurs exemples contrastés d'appropriation et de gestion, réelles et symboliques, des ressources en eau par les communautés rurales du Shaanxi et du Shanxi. Sans ignorer l'importance des représentations domestiques et privées, qui contribuent largement à la construction de l'imaginaire sur l'eau, on a cherché à replacer cette gestion hydraulique dans des contextes géographiques, historiques et sociaux précis, afin de retrouver les formes particulières d'organisation dont se sont dotées ces sociétés du nord de la Chine. Notre travail a, pour l'instant, mis en évidence l'idéal d'une répartition et d'une utilisation équitables des ressources, si peu abondantes soient-elles. Cet idéal a engendré diverses représentations de l'intérêt privé et public, que défendent des organisations communautaires. Ce sont ces organisations et ces représentations que révèlent les matériaux présentés dans les quatre volumes que nous publions à présent.

Commencé à la fin de l'année 1998, le programme a associé des anthropologues, des historiens, des spécialistes de l'épigraphie et, dans certains cas, des géographes et des techniciens de l'hydraulique, au total une vingtaine de chercheurs chinois et français. En fait, dès 1996, des enquêtes préparatoires, menées dans des régions où l'irrigation a toujours été un problème difficile à résoudre, avaient permis de repérer des cas susceptibles d'être étudiés dans une durée historique de plusieurs siècles. Ces piste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révélées à travers des matériaux que des chercheurs locaux avaient, souvent, déjà recensés sur le terrain. Un premier critère de sélection des sites étudiés a donc été l'existence de matériaux écrits inédits, accessibles, et assez abondants pour mettre en lumière les changements et les permanences dans la gestion et l'utilisation de l'eau prises en charge par des associations au niveau infra-bureaucratique, c'est-à-dire au-dessous du niveau de la sous-préfecture.

Le fait que certains de ces matériaux continuent encore aujourd'hui d'être valorisés et utilisés par les communautés a constitué un deuxième critère de sélection. Les textes font apparaître non seulement des solidarités, mais aussi des tensions, des contradictions et des conflits ; ils constituent un patrimoine qui reste intelligible et qui est mobilisé par certaines communautés actuelles : c'est évidemment dans ces villages que nous avons choisi de travailler.

Enfin, il nous a fallu retenir les lieux où il était possible de nous appuyer sur des correspondants locaux attentifs à l'histoire de leur région, prêts à nous guider sur un terrain qu'ils connaissaient bien, tout en restant soucieux de replacer leur histoire dans un contexte général autorisant des comparaisons.

Nous avons ainsi sélectionné cinq sites au total : Jingyang-Sanyuan au Shaanxi, Hongtong et Jiexiu au Shanxi, trois zones où existent des systèmes d'irrigation anciens dont certaines parties sont encore en fonction aujourd'hui ; Pucheng au Shaanxi, et enfin un groupe de villages situés à la limite entre Hongtong et Huozhou au Shanxi. Bien que ne présentant pas d'organisation hydraulique, ces deux derniers sites ont été étudiés à des fins comparatives. A Pucheng, la gestion symbolique des ressources en eau dépend d'une association de onze communautés célébrant une divinité réputée faire venir la pluie ; au Shanxi, c'est la répartition de l'eau domestique qui fait l'objet d'une alliance très ancienne entre cinq communautés villageoises pourtant divisées par leur rattachement administratif à deux entités différentes, la sous-préfecture de Hongtong et la municipalité de Huozhou.

Notre travail a essentiellement comporté deux volets : une recherche de terrain, destinée à collecter des matériaux inédits et à comprendre leur fonction grâce à des entretiens systématiques avec les membres des communautés ; une analyse de ces matériaux à la lumière d'autres documents et d'une réflexion interdisciplinaire. Les résultats de cette recherche seront présentés dans le cadre d'u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et feront l'objet d'une publication distincte. Sans préjuger de la valeur de ces résultats, nous voudrions souligner ici l'intérêt propre des matériaux que nous présentons. Nous évoquerons donc, tour à tour, les conditions et l'objectif de notre collecte, notre méthode, et la forme que nous avons choisi de donner à notre présentation.

La collecte des matériaux a été largement facilitée par le travail effectué dès les années 1980 par les administrations hydrauliques de certaines sous-préfectures. Peu accessibles, les quelques publications issues de ce travail nous ont été aimablement fournies par les auteurs ou par leurs institutions. Elles réunissent surtout des documents retrouvés le plus souvent dans les villages : textes épigraphiques, réglementations et registres hydrauliques, manuscrits officiels et privés — rapports, descriptions de dispositifs techniques et de conflits.

Pour l'essentiel, ce sont des documents analogues que nous présentons ici. Au-delà de précieuses indications sur la nature de la documentation existante, ces volumes nous ont d'abord convaincus que, contrairement aux idées reçues, les documents propres à l'histoire de l'hydraulique en Chine du Nord n'étaient pas rares. Or, ce gisement de textes épigraphiques et de manuscrits reste largement inexploité. Même si une des raisons avancées pour expliquer cette sous-exploitation est l'absence de moyens et de compétences,